

This document is downloaded from DR-NTU, Nanyang Technological University Library, Singapore.

Title	开拓鲁迅翻译研究的新视野——评王友贵新著《翻译家鲁迅》
Author(s)	崔峰 Cui, Feng
Citation	Cui, F. (2006). 开拓鲁迅翻译研究的新视野——评王友贵新著《翻译家鲁迅》. 中国比较文学, 1, 166-171.
Date	2006
URL	http://hdl.handle.net/10220/42467
Rights	© The Author(s) and Comparative Literature in China (中国比较文学). This paper was published in 中国比较文学 and is made available as an electronic reprint (preprint) with permission of 中国比较文学. The published version is available at: [http://gb.oversea.cnki.net/kcms/detail/detail.aspx?recid=&FileName=ZBJW200601017&DbName=cjfd2006&DbCode=CJFD&uid=WEEvREcwSIJHSldRa1Fhb09jMjQxNjFWWXZZUmFBK2U4aFczZ3UvdHNzc0=\$9A4hF_YAuvQ5obgVAqNKPCYcEjKensW4ggI8Fm4gTkoUKaID8j8gFw!!]. One print or electronic copy may be made for personal use only. Systematic or multiple reproduction, distribution to multiple locations via electronic or other means, duplication of any material in this paper for a fee or for commercial purposes, or modification of the content of the paper is prohibited and is subject to penalties under law.

开拓鲁迅翻译研究的新视野 ——评王友贵新著《翻译家鲁迅》

崔 峰

(上海外国语大学 语言文学研究所,上海 200083)

中图分类号: I106 文献标识码: E 文章编号: 1006-6101(2006)01-0166-06

国内外学界对鲁迅的研究几乎与其创作同步,“从20世纪最初10年的末期开始萌芽,到20—30年代滥觞和初步发展,经40年代的高峰,又经历以后的递进、挫折、复苏、开拓,至今已近一个世纪。在这一长时期的发展过程中,鲁迅研究的论著,从未间断过发表与出版。”^①但纵观百年来的鲁迅研究,无论是1920—40年代主要对其创作文本的研究,还是解放后至文革前对其思想的研究,或是80年代后学界开始转向对鲁迅与中外文化关系的研究,对鲁迅翻译研究的忽略始终是客观存在的问题。我们对鲁迅先生的评价,在很多场合,包括中小學生课本、新闻传媒中还在沿用毛泽东的“文学家、思想家、革命家”这个特定时代背景下提出的“定论”。就我目前所做的“鲁迅翻译研究论文论著索引(1924—2005)”统计,迄今国内外共发表鲁迅翻译研究论文218篇,其中国外25篇;工具书1部;另有论著3部:一部是斯德哥尔摩大学中国学系的伦德伯格博士(Lennart Lundberg)撰写的博士论文*Lu Xun as a Translator*,于1989年出版;第二部是2004年4月出版的刘少勤著《盗火者的足迹与心迹——论鲁迅与翻译》;第三部便是于2005年7月出版的王友贵教授的《翻译家鲁迅》。^②光从研究数量上讲,与汗牛充栋的鲁迅创作、思想、文化研究相比,鲁迅翻译研究实是冰山一角,是亟待我们挖掘的宝藏。王友贵新著《翻译家鲁迅》的意义由此可见一斑。

《翻译家鲁迅》共分十二章,仅从各章节的标题就可窥探出作者在选择鲁迅翻译研究的切入点时颇具匠心,新颖别致的观点在全书随处可见,为我们研究鲁迅翻译开拓了新视野。

第一章“世界意识与梦者鲁迅”揭示了一个“酷爱做梦”的鲁迅。作者指出,正

是早期的科学之梦,推动了鲁迅去翻译《月界旅行》、《地底旅行》、《造人术》等科学幻想小说。本章中,作者比较了林纾以“译者为中心”、“以读者为本”的“过度中国化”的翻译方式。应该说,以林纾为代表的当时一批翻译家,都存在着在翻译过程中“过度中国化”的现象,或将某些认为有违中国传统道德规范的情节删去不译,或在字里行间穿插译者的评述感叹,或是将原作中的人名、地名中国化。关于这种翻译(编译、改译)现象产生的原因,以往学者亦有论述,如郭延礼先生认为这是当时的“译者为了适应中国人的欣赏习惯和审美情趣”和“受中国传统全知全能的‘说话人’(作家)的影响太深”的结果。^③而王友贵先生则认为这种翻译方式源自译者一种“中华乃世界中心”的意识形态的作祟,“在这种意识的操控下,本土意识过度膨胀,世界意识淡薄,译者往往毫无顾忌地使原作过度归化”,这种“要抹掉各民族特征(包括语言特征)的翻译策略”不仅表明了翻译家,也反映了中国读者、出版商各方“世界意识的淡漠”,而鲁迅1909年以与周作人合译《域外小说集》来表达对林氏翻译方式的不满,在作者看来则是对那种“中华乃世界中心”的意识形态的怀疑。此观点,道前人所未道,颇为新颖。

第一章的最后一节与第三章“现代意识与现代性”,作者把关注的目光投向了《域外小说集》。王友贵先生以新的研究视角——周氏兄弟在进行选目时因受西方现代主义思潮的影响所体现出来的现代意识——进行研究,自有其独到之见。作者还在以往学者对鲁迅译作反映的现代意识方面进行了开疆拓土,从艺术手法、表现主题等方面进行更深入的挖掘。另外值得一提的是,作者总结了《域外小说集》六个方面的开创意义。虽然这几个方面前人或多或少都有论及,但作者的归纳无疑是至今最完整的。

此外,作者尝试从特定的角度看鲁迅,描述通常国内的鲁迅研究不大提及的这位文化人的若干侧面,比如“浪漫的鲁迅”、“呆子鲁迅”、“白心的鲁迅”、“人类主义者的鲁迅”,这些内容主要集中在第四章“浪漫的鲁迅”、第五章“苦闷的鲁迅”、第八章“童心的鲁迅”等相关章节中。这些尝试性的描述,或许可以算是对鲁迅研究的一个补充,同时也在已经十分丰富的鲁迅画廊里,增添了几个有趣的鲁迅画像。而就是这些看似有趣的鲁迅画像,却与鲁迅对译作的选目有着内在的联系。读者不难发现,鲁迅正是以一颗未泯的童心翻译了《爱罗先珂童话集》、童话剧《桃色的云》,他假文艺启蒙、改造国民性的抱负及他那种以批判与讽刺来表达他对祖国的爱的“呆气”,在厨川白村的“呆子”说中体现得淋漓尽致,而富有同情心的鲁迅更是将毕生精力用于译介东欧等弱小民族的文学作品。

对俄苏文学的翻译是鲁迅翻译生涯的重心。作者也在第九章“苏联革命文学

和俄国文学的翻译”和第十章“想象苏联:翻译苏联文艺理论”进行了分析。鲁迅通过日译本转译苏联文艺理论,无论是译家自身的理论准备、对翻译对象的了解程度、思想理论的熟悉程度,还是接受方中国读者在新术语和新概念的知识准备方面,都是一件吃力不讨好的工作。究其原因,作者总结了三点:一是中国文坛发展的大势所迫。在与创造社、太阳社的论争中,鲁迅感到“‘革命文学’作家们在无产阶级文学理论上的模糊,在对方的激烈言辞中,鲁迅并不能感受到批评的力量”。作者接着引证日本作家增田涉的分析,指出“无产阶级文学即便在苏联,也还是初生的新事物”,鲁迅和苏联作家、理论家一样都处在探索、学习、了解之中,但增田涉却忽略了“翻译往往是鲁迅学习新事物一个重要方式”这一事实。其二是当时来自两方面的显在的压力和潜在的压力,即除太阳社、创造社外,还有以梁实秋为首的新月社,促使他搞清楚这些理论问题。而鲁迅的习惯做法,是“这类问题可以通过翻译、通过译介域外思想来学习,思考,思辨,来厘清自己头脑里的思想,甚至来解决他当时急于要解决的问题”,当“他(鲁迅)遇到重大事情的时候,他一般不大信任国内各家各派的言说,他也不认为本土的各种言说有值得他学习之处,不论是来自左的,还是来自右的。鲁迅的目光虽然始终盯住国内的问题,可每逢遭遇重大问题,他总是将探询的目光投向域外。”^④其三则是因了鲁迅的一种俄罗斯想象。确切地说是对于包括俄国、东欧、北欧弱小国家的深切同情。对于这些国家鲁迅“主要是凭借有限的文字材料,特别是虚构类的文学作品,还有文艺理论方面的材料,加上自己的想象,来作为确立对外关系的基础”。当然这样的想象未免与现实情况有差距,鲁迅的想象仅限于这些遥远的弱小国度。对于非常熟悉的日本和中国,他就较少用想象,以他准确的判断和惊人的洞察力表达了一种有别于“想象”的思维模式。可以说,作者把分析的焦点放在鲁迅译介俄苏文学,特别是文艺政策和无产阶级文学理论上,首先就抓住了鲁迅自20年代末加入“左联”后翻译工作的重心。这段历史的形成,与鲁迅思想的转变、外在斗争的需要等因素密切相关。而作者在准确把握这段历史的基础上,深入挖掘其产生的原因、进行重点突破,以上三点分析中情、中理,富有创新,令人叹止。

《翻译家鲁迅》一书对鲁迅翻译文本的细读、对史料的考证等这种严谨的学风、求实的态度,的确为当前颇为冷清的鲁迅翻译研究界带来了一股清风。但是,在罢读全书后我也有些不满足,在此有两个问题想向王友贵教授请教。

首先是关于此书的研究路向。作者于2001年出版了《翻译家周作人》,与这次出版的《翻译家鲁迅》互为姊妹篇。早在《翻译家周作人》中作者就说“本书的研究路向是描述性的,以译文为心”,“具体说来,就是通过周氏大量的翻译作品

的具体分析,试图探察周作人的翻译文学和翻译活动在文学史上的意义,以及与周氏自己思想和文学观之间的相互作用”。^⑤再来比较《翻译家鲁迅》,作者沿用了相同的研究路向,从特定的角度对鲁迅进行“尝试性的描述”(见该书内容提要)。作者指出他的这种研究路向来自于伊文—佐哈(Itmar Even-Zohar)的“多元系统理论”,以及受其影响的图里(Gideon Toury)提出的以译文为中心的翻译理论,和赫尔曼斯(Theo Hermans)对这批学者的共同特点所做的归纳。我想指出的是,虽然这些学者指出了以译文(译入语方面)为主要研究对象,但他们并非把“译文”视作一个静态的研究对象,为研究译文而研究译文恰是他们所反对的。所以作者对这些理论的理解似乎存在着一定程度的误读。早在1977年,佐哈就修正了多元体系假设,使其能进一步容纳文学与社会内部的经济因素之间的关系,他自己也承认在等级模型里,“选择译作的方法以及译作在文学系统内部的功能等过于简单化,必须将一些超文学的因素联系在一起考虑,如资助行为、社会条件、经济条件以及组织操作等”,可见,多元系统理论的优点正在于留下自我扩展的空间,把对文学的研究与对社会经济等超文学因素的研究联系在一起。而图里在其目标系统理论里认为“译文本身并不具有‘固定的(fixed)’同一性,译文总是受各种各样的社会文学因素影响”,“在互相作用的文化系统中,原文和译文统一于符号学网络”。^⑥西方已有学者指出“图里的继承者们忽略了对原文和译文的系统研究”,我想这样的批评用于《翻译家周作人》和《翻译家鲁迅》过分重视对译文的细读,而忽略原文的研究路向恐怕也是中肯的,因为图里的描述系统不仅仅包括对译文的描述,也包括了对原文的描述及二者之间的统一。赫尔曼斯的归纳就更为简洁明了:“他们共通的地方,简单而言,在于认同文学是一个复杂而动态的系统”,“他们很有兴趣去探究影响翻译产生及接受的准则和限制”。^⑦由此可见,作者对这些理论的误读,造成了作者的研究路向过分依赖以译作为中心,把图里的“目标系统”理论极端化,从而忽略了对原文与译作间的关系,译作产生过程中受出版机构、时代背景、意识形态等诸多因素的影响的研究。比如颇受争议的鲁迅“硬译”研究,如果像作者一样仅仅进行“描述性”的阐释(见《翻译家鲁迅》第七章第三节),是不能认清鲁迅“硬译”产生的实质的。在我看来,鲁迅“硬译”的产生已经不是操作层面一个简单的翻译方法问题,它与鲁迅的“译经意识”、意识形态对翻译主体的操控、出版赞助商和审查机构的影响以及鲁迅因受时代背景的影响而形成的语言观等译作文本外的因素密切相关。其实,王友贵先生也已意识到“翻译作品一旦面世,必然产生影响,对这种影响之研究属于谢天振先生所说的译介学范畴”,而根据他所使用的研究路数,他“将注意力放在对译者本身的影响上,其目的仍然是

期望勾勒文学家翻译家与文学态度、趣味的发展衍变轮廓,而将译作对于普通受众的普遍性影响,留给其他的研究者。”^⑧如果我们细读“多元系统派”的理论,就不难发现,它与译介学研究实有共通之处。在译介学领域里“多把研究对象(译者、译品或翻译行为)置于两个或几个不同民族、文化或社会的巨大背景下,审视和阐发这些不同民族、文化和社会是如何地进行交流的。”以及“在语言的转换过程中表现出来的两种文化和文学的交流,它们的相互理解和交融,相互误解和排斥,以及相互误释而导致的文化扭曲与变形。”在译介学里,我们把“翻译看作是文学研究的一个对象,把任何一个翻译行为的结果(也即译作)都作为一个既成事实加以接受(不在乎这个结果翻译质量的高低优劣),然后在此基础上展开对文学交流、影响、接受、传播等问题的考察和分析。”^⑨因此以译介学视角研究鲁迅翻译相对来说比较超脱,视野更为开阔,更富审美成分。所以,对鲁迅翻译的研究,作者所进行的对译本的细读固然是必不可少的一步,但仅仅局限于译本,显然是不够的。我们完全可在此基础上拓宽鲁迅翻译的研究方法,从多元系统论、译介学的研究视角开辟研究的新视野。

第二,作者所提出的“弱国模式”和“鲁迅模式”的合理性也可以商榷。“弱国模式”是作者在他的另一部著作《中国六位翻译家》中提出的,指的是“以鲁迅为实际领袖,茅盾为该模式的核心人物之一”对弱小国家文学作品的译介。作者认为“可以归入这个模式的作家,并不以是否留学欧美为准,部分留学日本,或者不曾出洋者,如田汉、郭沫若等,亦可归入”。^⑩到了《翻译家鲁迅》中,作者以“鲁迅模式”替代了“弱国模式”,其理由是因为鲁迅是这一所谓“模式”的领袖、开拓者。我认为如果仅仅“主要依据译者翻译选目的路线或特点来划分”,而把这些翻译家的翻译称作某种模式显然是不够合理的,作者考虑的层面不尽全面。首先,把鲁迅称为译介弱小民族文学的开拓者虽然无可厚非,但把之后译介弱小民族文学的那些翻译家也都归在鲁迅麾下,就抹杀了翻译家选目时体现出来的主体性,而过分夸大了鲁迅的影响。这些翻译家们学术背景、思维方式、时代背景等均与鲁迅有很大的不同,因此在选择弱小国家文学作品时的出发点、文学体裁、产生的影响也不可能与鲁迅完全重叠。把他们统统归成“鲁家军”,而编排成一种统一的模式,确实小觑和冤枉了他们。其次,“模式”一词,让人觉得有固定化、程式化、抽象化之嫌。因此以“鲁迅模式”替代“弱国模式”就更不合理了。作为翻译家的鲁迅自有不同于他人的理论见解和实践方法,纵观其翻译生涯,他的翻译理论和实践从来不是一成不变的,光就翻译方法而言,他就经历了早期的摇摆到中期的直译再到后期的硬译三个阶段;而他前期受进化论的影响到后期向共产主义靠拢的思

想转变,也影响了他在选目上的不断变化。作为一个一生都在探索的翻译家,将其翻译生涯以“模式”二字固定化,以及将后来的翻译家们仅仅因为都曾译介过弱小国家文学作品,而共同归为“鲁迅模式”,显然有失偏颇。每一个翻译家都有自身独特的翻译理念和方法,并非“一个模子里蒸出的馒头”。每个历史时期,都会有翻译家选译弱小国家的文学作品,我认为将其作为一种文学翻译史的“现象”来看待更为合理。以此类推,作者在《中国六位翻译家》和《翻译家鲁迅》中提出的诸如“西化模式”,“名士模式”、“通俗文学模式”均存在这样的问题。

尽管如此,王友贵的这本《翻译家鲁迅》确为近年来鲁迅研究界一项不可多得的硕果。其间之得失,对我们进一步开拓鲁迅翻译研究的新视野都是不无裨益的。

注:

- ① 彭定安:《鲁迅学导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第1页。
- ② 王友贵先生在其《翻译家鲁迅》序言中说道;“专门讨论翻译家鲁迅的著作,除了斯德哥尔摩大学中国学系的伦德伯格博士(Leannart Lundborg)撰写过一篇博士论文,中国国内迄今未得见。”此说有误。因就在王先生写这篇序言2004年5月之前一月,即2004年4月,百花洲文艺出版社出版了由刘少勤著《盗火者的足迹与心迹——论鲁迅与翻译》一书。不过,因两者时间相隔太紧,王先生很可能没有见到该书。
- ③ 郭延礼:《中西文化碰撞与近代文学》,山东教育出版社1999年,第145—148页。
- ④ 王友贵:《翻译家鲁迅》,南开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227—231页。
- ⑤ 王友贵:《翻译家周作人》,四川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4页。
- ⑥ 廖七一编著《当代西方翻译理论探索》,译林出版社2000年,第67—71页。
- ⑦ 王友贵:《翻译家周作人》,四川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4页。
- ⑧ 王友贵:《翻译家周作人》,四川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14页。
- ⑨ 谢天振:《译介学》,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9年,绪论,第10—11页。
- ⑩ 王友贵:《中国六位翻译家》,四川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216—217页。